

“抗战记忆史”的回顾与前瞻

郭辉 杨子佼¹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20 世纪 80 年代，记忆史研究进入中国史学界，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方法与新路径。在抗战史研究领域，学者积极汲取记忆史理论与方法，使“抗战记忆史”成为抗战史研究的新活力。已有的抗战记忆研究大致可分为三方面：抗战事件记忆研究、抗战人物记忆研究和抗战空间记忆研究。记忆史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抗战记忆史的研究领域相当丰富，不仅可进行实证研究，也应开展理论研究，并具有新范式与现实价值的意义。抗战记忆史研究通过定位、挖掘、反思抗战记忆体现出独特的研究路径。在图像证史、公众史学、心态史影响下，抗战记忆史将有广阔的研究领域和空间等待发掘。

【关键词】 抗日战争 历史记忆 新文化史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77 (2020) 08-0114-09

近年来史学研究范式历经多次转型和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记忆史研究开始进入中国史学界，历史研究在新理论和方法指引下，在研究路径上也多有突破。相较于传统史学，记忆史研究的关注重点并非历史事件或人物本身，而是指事件或人物之后历史记忆的产生、流传，以及为何、怎样流传这些历史记忆。多年来中国记忆史的研究成果，有不少即属于“抗战记忆史”，但多为实证性研究，较少从理论与方法层面宏观系统论述抗战记忆史。相关理论阐述的滞后不利于抗战记忆史的长远发展，并且这些实证研究在研究话题、研究方式、研究突破方面多有支离破碎之感，只有少数如“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般的成熟研究领域。鉴于此，本文试图在梳理已有抗战记忆史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研究构想、研究路径、研究展望三方面思考抗战记忆史，从而推进抗战史领域历史记忆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一、研究回顾

二十世纪末即有学者将“历史记忆”概念运用于抗日战争相关研究。李奕明从传播学角度评述《南京大屠杀》电影，将影片视为历史记忆的传播媒介，认为影片应再现真实的抗战记忆，而非淡化民族苦难与耻辱。^{[1] (p15-17)} 此即探讨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传播问题。逢增玉大致爬梳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抗战文学，考察了抗战文学书写与抗战记忆的相互关系，视抗战文学中抗战历史的叙述为“历史记忆、历史真实的当代化和民间化的调整”，抗战文学为强化国人民族记忆与历史记忆的重要手段。^{[2] (p109-117)} 该类研究虽运用“历史记忆”概念进行考察，但未对之进行详细解释，且“记忆”的相关内涵限于文艺层面，未延伸至哲学和史学。

然而，欧美学界历史记忆研究的蓬勃发展，给中国史学界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历史记忆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学界关注，研究内涵愈发深刻。^{[3] (p69)} 于此背景下，2003 年，王家范发表《从集体记忆的谬误中出走》一文，阐述日本的“集体权威人格”通过个人记忆、集体记忆、沟通记忆等环节的转化，演化为根植于系列记忆网络中的被扭曲的历史记忆，因而重审南京大屠杀时，

¹作者简介：郭辉（1983-），男，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中国思想史研究所暨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子佼（1996-），女，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湖南抗战记忆史研究”（18ZDB020）系列成果之一。

应跨越中日两民族的界线，走出集体记忆的谬误。^{[4] (p100-104)}该文强调集体记忆的现实性。张连红则探究了南京市民关于大屠杀的创伤记忆的形成与变化，指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纪念碑架通了南京市民连接历史与现实的记忆通道，南京市民创伤记忆中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与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情感缠绕而共存共生，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已经超越原始复仇阶段，情感记忆更多地表现为宽容。^{[5] (p147-152)}此时所研究的“记忆”不再指向其表面概念，而是将其内涵延伸至“公共记忆”层面，关注“集体记忆”与历史的关系，真正意义上的抗战记忆研究也从这时初露头角。此后抗战记忆研究大致朝三方面发展，分别为抗战事件记忆研究、抗战人物记忆研究和抗战空间记忆研究。

（一）抗战事件记忆研究。

在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社会背景下，南京大屠杀记忆的形成与走向引起学界广泛探讨。何亦农、陆剑杰等人认为南京大屠杀给国人留下了“国弱挨打，百姓遭殃”“政治腐败，军纪不整”“文化落后，民众不振”三种记忆，他们提出要将此历史记忆融入当代忧患意识，把忧患意识转化为加快发展之志。^{[6] (p46-49)}此即对南京大屠杀记忆的历史走向进行了新思考。刘燕军考察了社会剧烈变化的历史背景下，南京大屠杀记忆的传递与变迁，解释大屠杀记忆与现实政治的相互联系。^{[7] (p5-22)}李昕则认为在多元的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南京大屠杀历史和记忆的结合逐渐衍生出多种形态的文化记忆，经历了从“文本记忆”到“身体记忆”，从“内容记忆”到“仪式记忆”，从“人之记忆”到“地之记忆”的转向，这些记忆的变化突破了传统历史书写的范畴，日趋多元和立体。^{[8] (p17-25)}此即考察南京大屠杀记忆的多种表现形式，探究了此记忆的社会建构过程。此外，李洪涛、黄顺铭，^[9]王卫星，^{[10] (p36-42)}钟梦媛^[11]等人均从不同角度探究了南京大屠杀记忆。

除南京大屠杀记忆外，还有研究注重战时历史事件的纪念，强调纪念即传播社会记忆，纪念活动中的仪式、话语、象征符号是唤起国民记忆、塑造集体记忆的重要手段。郭辉将“九一八”纪念作为“文化事件”，阐释了国民政府纪念活动中话语所蕴含的思想与内涵，认为抗战时期国民党的“九一八”纪念起到凝聚民族精神、提供精神动力、增强社会认同的作用。^{[12] (p118-127)}他还将研究方向对准“七七”纪念的制度设计、仪式活动、话语表达等方面，并从政治动员的角度观察“七七”纪念，表示“七七”纪念从开始的制度设计，到仪式活动的操演，再到纪念话语的表达，整个过程皆与抗战政治动员紧密联系在一起。^{[13] (p143-150)}该方面研究注重解读政府对抗战时期历史事件的纪念，及其对纪念活动的利用与诠释，挖掘纪念活动包含的不同利益诉求。

此外，其他事件的历史记忆同样引起学界关注。罗贵榕通过分析滇西抗战在不同叙事类型下的不同书写，揭示其在抗战记忆中遭遇被边缘化、被遮蔽的过程及原因，作者认为“抗战叙事的正常化、理性化，正是我们这个民族走向理性、走向包容、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表征”。^{[14] (p143-146)}强调了叙事书写对历史记忆的作用。侯杰、常春波通过梳理喜峰口战役亲历者、亲见者及亲闻者的口述和笔述资料，探讨这些特定群体的历史认知与群体记忆之间的关系，试图对长城抗战的部分史事去伪求真。^{[15] (p144-148)}潘洵、高佳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重庆大轰炸”之“轰炸记忆”的演变与发展，作者认为“历史记忆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过程，永远处于‘记忆’与‘遗忘’的互动、‘彰显’与‘遮蔽’的交替之中，特别是对于‘重庆大轰炸’这样的创伤记忆，其演变与建构的过程，不仅与国家民族立场相关，更与时代社会变迁紧密相连”。^{[16] (p135-146)}从而揭示出历史记忆的演变与政治立场、时代变迁的相互关系。从历史记忆的角度对抗战事件进行研究，并非描述事件本身，也非梳理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而是聚焦后人对事件的情感、态度与利用。抗战事件虽然内容丰富，但有其总体研究趋势，即分析事件记忆的形成背景，梳理记忆的变迁过程，揭示记忆的功能和影响。

（二）抗战人物记忆研究。

抗战将领历来为史学界的重要研究对象，以往多侧重人物事迹、思想等，而“历史记忆”的引入丰富了该方面研究。李鹏飞通过考察抗战期间社会各界对张自忠的纪念与记忆，揭示张自忠在人生的三个重要时期的形象变化，认为张自忠英雄形象的沉浮与国家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受到社会舆论的深刻影响，并最终成为国家宣传动员的政治工具。^[17]汤锐认为白求恩因其无私奉献的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信仰纪念的符码，他从现实建构、社会分层建构和艺术建构三个方面分析中共对白求恩的纪念方式，最后得出结论“白求恩进入中共领导公共话语体系范畴之内，中国社会各界遂逐渐形成了对于白求恩的集体记忆，同

时建构着中国共产党的一种伦理精神”。^{[18] (p18-25)} 总体来看，学界对抗战人物记忆的研究，大都从纪念入手，关注政治对人物历史记忆的影响。

抗战时期历史人物的记忆成为抗战记忆史研究的热点之一。郭辉注意到抗战期间“民族英雄”成为国家舆论宣传的重要手段，是增强国民认同感的重要工具，国家通过纪念“民族英雄”，利用“民族英雄”相关记忆进行抗战动员。他提出抗战时期是民族英雄谱系建构的高潮期，此时民族英雄成为国家宣扬抗战的重要工具。他从抗战时期国家对成吉思汗历史记忆的重新唤起出发，剖析该时期在政局、社会、党政关系影响下的成吉思汗纪念活动，从而探析成吉思汗的形象如何被塑造与建构。^{[19] (p116-123)} 除此之外，郭辉认为该时期史可法、文天祥等英雄人物的历史记忆在抗战期间同样被重新挖掘，为时人所纪念和记忆。史可法是南明抗清的英雄人物，抗战时期其“民族气节”正好符合抗战需要，他的形象与抗战所需英雄形象高度重合，所以被塑造成“具有高度自我民族意识、奋力抵抗外族的人物”，成为抵御外侮的榜样，以此起到抗战宣传的作用。^{[20] (p71-77)} 文天祥作为抗元典型人物，其相关事迹在抗战中不断地被叙述和重复，由此南京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建构出爱国、不屈不挠、成仁取义的“文天祥”记忆，为抗日战争这一当时最大的现实政治服务。^{[21] (p68-74)} 郭辉对抗战期间“民族英雄”的研究，跳出了对其历史记忆的简要叙述，结合该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发掘了“民族英雄”记忆背后的建构性与象征性，以此揭示“民族英雄”的记忆作用。

（三）抗战空间记忆研究。

国内学界用“历史记忆”观察建筑空间，李恭忠与陈蕴茜应最具代表性。2004年，李恭忠发表《开放的纪念性：中山陵建筑精神的表达与实践》一文，即强调纪念性空间对国民集体记忆的认同与凝聚功能。^{[22] (p90-92)} 随后，他将视野拓宽至中山陵的修建、葬礼、纪念仪式等方面，揭示各类“操演”下的中山陵成为“现代中国历史记忆”的过程。^[23] 陈蕴茜关注到中国近代公园具有民族集体记忆的意义，考察了国家通过公园建设在日常生活层面的民族主义建构。^{[24] (p82-95)} 她还发表理论性文章，论述纪念空间与社会记忆的辩证关系，即纪念空间生成记忆，记忆主体重塑纪念空间。^{[25] (p134-137)} 总体而言，李恭忠与陈蕴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建筑空间如何凝聚集体记忆，或是记忆主体如何通过空间表达价值需求，他们注重空间的回溯性功能，并且比起建筑的本体价值更关注其思想文化价值。

史学界对建筑空间的不断深入研究，也使学者们开始关注抗战遗址、建筑。王晓葵对广西会战的相关遗址和纪念碑进行整理和分析，探究了广西会战在当时和后来如何被记录和表象化，人们的抗战记忆如何通过这些遗址和纪念碑上对战争的记录而被建构。^{[26] (p266-287)} 强调空间对记忆的塑造功用。殷冬水以东北沦陷史陈列馆为个案，研究分析公共建筑承担的“塑造公民国家认同的功能”。他认为国家依赖陈列馆所提供的想象空间，再现了历史情境。东北沦陷史陈列馆作为国家生产和塑造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呈现了抗战的暴力记忆、苦难记忆、反抗记忆和宽恕记忆，它采用图像叙事、文字叙事和数字叙事三种方式，增强国家叙事的说服力、吸引力和感染力。^{[27] (p174-184)} 该研究揭示出历史记忆、国家权力和公共空间的关系问题。刘于思以腾冲国殇墓园及忠烈祠为代表的战争记忆空间为研究对象，揭示在这些空间构筑期间的国家、社会关系变迁，以及战争记忆空间的争夺和博弈所重塑的权力结构。^{[28] (p115-119)} 该研究分析了以国殇墓园及忠烈祠为载体的腾冲抗战记忆的变迁过程。不难看出，诸多研究成果强调建筑空间承载的“记忆”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作用。长久以来，学界通常从遗址保护、文化产业管理的角度对抗战遗址、建筑进行研究，继而忽视了此类空间的内在反映，将“记忆”概念引入抗战建筑、空间研究，是对该研究领域的提升与新思考。

二、研究构想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即通过纪念“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回溯相关记忆，利用这些记忆进行抗战动员。解放战争期间，抗战记忆便成为党派政治斗争的工具，亦如抗战胜利纪念日被当作政治宣传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国民政府甚至将内战比拟成抗战的延续，试图利用抗战精神进行罪恶的政治宣传。^{[29] (p131-13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执政党通过编写文书、纪念哀悼、修护遗址遗迹等各种方式保存和延续抗战记忆，如我国以法律的形式将9月3日设立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日，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由此举行法定的、国家层面的纪念和哀悼活动。除此之外，抗战记忆在加强民族与国家

认同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民众通过参与纪念活动，阅读抗战相关资料，或是参观抗战遗址获得抗战记忆，在抗战记忆中获得自我归属以及民族自豪感。回顾抗战记忆的起伏消长，其无外乎存在两种价值取向，一是对过往历史的叙述，二是对现实存在的诉求。基于该两种价值取向，具体研究有关抗日战争的记忆时，既要分析这些抗战记忆如何产生、如何表达、有何内容，也要结合时代背景、政治立场、社会环境对记忆所蕴含的现实诉求加以探讨，发掘抗战记忆的功用价值。

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忆能引起学界关注成为研究对象，得益于记忆的保存与延续。抗战记忆依靠文字记载，如各种档案、报刊、日记、回忆录等文本资料使其得以保留。除此之外，还有录音、照片、影视、音乐、歌谣等视听资料承载抗战记忆。更为特别的是，国家、政府与党派因自身或社会需求在保存抗战记忆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他们制作各种抗战文化产品，为相关人物树碑立传，修护抗战遗址遗迹，兴建抗战纪念场所，确定国家层面的抗战纪念日，举行抗战纪念活动，以此强化人们的抗战记忆。如此而言，抗战记忆的呈现方式非常多样，不管是文字记载还是社会互动，都成为该记忆的表达方式。也正因如此，抗战记忆史研究有了丰富的史料来源，这成为该研究的重要支柱。

海量的史料支撑下，抗战记忆史研究的内容将会相当丰富。包括抗战期间的重大战役如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湘西会战、百团大战、台儿庄战役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地道战亦可囊括其中；与抗战相关的历史人物如毛泽东、蒋介石、朱德、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等，当然除了中外知名人物，底层民众也值得关注；各种抗战纪念日如“九一八”纪念、“七七”纪念、民族扫墓节、孔子诞辰纪念日、南京大屠杀公祭日、抗战胜利纪念日等；与抗战相关的文化作品如歌曲、诗词、小说中对抗战的描写，或是教科书对抗日战争的记叙。另外，还可以对抗战相关的纪念场域进行探讨，如抗日战争博物馆、抗战遗址、忠烈祠、纪念公园、烈士墓等，并且在这些场所进行的纪念活动、仪式操演也要纳入考察范围。“抗战记忆史”的研究对象与抗战史的相比可能并无明显差别，只是研究视角发生了变化，抗战史强调研究事物本身，而抗战记忆史则强调对抗战人物事件发生之后历史记忆的研究。用记忆史理论与方法观照抗战史，无疑能为抗战史研究注入新活力。

除了实证研究，抗战记忆史研究还要将理论研究纳为己任。理论研究是抗战记忆史研究的基础，它需要回答“何为抗战记忆史”“如何研究抗战记忆史”“抗战记忆史有何意义”等基本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对“抗战记忆史”的内涵、方法、意义、功能进行系统考察，从而形成抗战记忆史专题的理论研究。一方面，就整个记忆史的理论研究而言，学界在记忆史领域的理论研究不多，以翻译外国理论为主要途径，而国情、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国外的研究理论并不见得能适用于中国史学界，如此情况下必须产生适合于本土的记忆史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又因为抗战记忆史是记忆史的具体研究方向，用宏观的记忆史理论指导研究，势必不能面面俱到，因此抗战记忆史理论需要在记忆史理论研究上进一步深化，形成抗战记忆史专题的理论研究。如此情况下，除了要利用西方记忆史理论为抗战记忆史理论研究打好基础外，更要在此层面上进行创新，以确保抗战记忆史理论能够为我所用。并且，记忆史学与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哲学等多种学科息息相关，其理论研究离不开相关学科的理论支持。因此在研究过程中，需拓宽研究视野，综合学科知识，以此推动抗战记忆史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抗战记忆史研究利用了记忆史的研究视角，摒弃了传统抗战史的书写方法，是抗战史范围内的全新尝试，也是抗战史研究的应有之义。所以，用记忆史方法丰富抗战史有以下意义。

抗战记忆史为抗战史研究提供新范式。时至今日，抗战史研究已经较为成熟，无论是对抗战的事件、人物的研究，还是对抗战时期的政治状况、社会思潮的研究，学界已存在不少成果。抗战记忆史研究将眼光聚焦至抗日战争相关事件或人物发生之后的时空，对于已经研究成熟的话题，抗战记忆史也能为其开辟出一片新天地。以南京大屠杀为例，抗战记忆史不再关注大屠杀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而是考察大屠杀记忆的表达方式、建构过程，以及由此反映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情况，此即对南京大屠杀话题进行记忆史层面的新探讨。因此，在传统的抗战史研究逐渐趋于成熟之际，将记忆史研究融入抗战史，是对抗战史研究的新思考，也是丰富抗战史研究成果的新途径，它将“彻底改变史学研究中成熟话题难以为继的困境，成熟正是进行历史记忆研究的起点”，^{[3] (p83)}推动抗战史研究走向新的繁荣。

抗战记忆史研究具有典型的现实价值。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研究的目的便是要反思历史、前瞻

未来，抗战记忆研究正是以此为立足点，以研究解决现实需要。譬如当今国际上对中国抗战存在着质疑与非议，其中最主要的有：“中国共产党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没有做出太多贡献”“中共夺了国民党研究和纪念抗战的主导权”等。抗战记忆史研究力图挖掘各方抗战记忆以还原历史真相，全面诠释真实的抗战场景，肯定中国的抗战价值，重塑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如此，抗战记忆史研究不仅富有研究层面的意义，它还能够为社会现实服务。也正如沈坚所强调，记忆史研究需“以现实关怀为立足点，公开地以现代问题为出发点，追溯以往，以满足现代人的现代要求”。^{[30] (p213)}

三、研究路径

史学领域对“记忆”的研究不同于心理学，心理学家关注个人记忆，而历史学家则更多地关心集体、社会记忆。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忆是透过个人记忆，超越群体记忆，达到一个令人瞩目的集体记忆的“记忆”。集体记忆与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相互联系，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相互交织。基于抗战记忆深刻的内涵，“抗战记忆史”的研究路径可从“定位”“挖掘”“反思”三个方面入手。

定位抗战记忆。记忆有着“个人记忆”“群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的记忆各有所指。第一层的“个人记忆”可以是抗战亲历者、听闻者作为单独的个体的记忆。第二层的“群体记忆”则可指向抗战中的某一军队、某一村落、某一社会团体的记忆。最后一层的“集体记忆”具有公共记忆的性质，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抗战记忆，它是具有社会功能与目的的社会记忆。而记忆的内在逻辑也涉及三个关键的问题，即记忆的主体、客体和载体，它们分别是谁的记忆、记忆什么、如何记忆。抗战记忆的主体包括政府、党派，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自然包含在内，因为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众多参与二战的国家，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家的政府和党派也应纳入记忆主体的考察范围。此外，民间社会也可成为记忆的主体，如抗战老兵、士兵家属、华侨、日军士兵等。抗战记忆的客体可以具体到与抗战相关的事件、人物、纪念、战略思想等。抗战记忆的载体即抗战记忆的呈现方式，它包括文本、图像、抗战遗址、抗战纪念场所。定位抗战记忆即明确记忆的所属层次和内在逻辑，从承载着抗战记忆的文字、建筑、影像等入手，找寻与抗战相关的事件、人物、地点、纪念活动的记忆，考察这些对象在历史上遗留下的痕迹。

挖掘抗战记忆。与“记忆”相对应的概念便是“遗忘”，一些研究者认为“记忆、历史、遗忘”是与过去发生联系的三驾马车。^{[30] (p221)}现有的抗战记事在形成过程中肯定存在对过去的遗忘，挖掘记忆首先要挖掘这些被遗忘的记忆。一方面，记忆与遗忘的产生，是该时期记忆主体的选择，所遗忘的记忆也许被认为是不重要的、碎片化的，但是如何判定其重要与否，随着记忆消失已无法准确地下定论。这时，个人记忆和群体记忆就显得尤为重要，集体记忆是具有身份认同的集体对某段记忆的共同认可，个人记忆与群体记忆与之相比则更具有独立性，他们可能保留着那些被“遗弃”的历史记忆。因此，集体记忆与个人、群体记忆之间的差异将是挖掘这些被遗忘的抗战记忆的关键。另一方面，雅克·勒高夫认为“记忆和忘记是各阶级、群体以及个体们的焦点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曾经支配过并且正在支配着社会的历史。各种忘记以及消失的历史都体现出了集体记忆中存在着操纵机制”。^{[31] (p60)}即人们的历史记忆为一定的社会机制所支配。从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脉络来看，抗战记忆的产生遗忘与政党博弈、政治外交、政治诉求息息相关，弄清政治对抗战记忆的影响，也是挖掘尚未浮现的抗战记忆的途径。

法国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提出“记忆之场”理论，他认为“记忆之场”一开始便意味着两个层面的现实的交叉，一种现实是可触及、可感知的，另一种则是承载着一段历史的纯粹象征化的现实。即道出历史记忆的两种特性：真实性与象征性。基于历史记忆的这两种属性，诺拉称历史学家的任务便是“解释它的结构，确立它的层次，分辨沉积的部分与流失的部分，剥离出它坚硬的内核，揭露假象和错觉，让它变得清晰起来，道破它的未明之意”。^{[32] (p87)}即史学家应当剖析历史记忆的深层含义，寻求历史的真相。挖掘记忆也以此为出发点，力图挖掘记忆蕴藏的内涵。面对记忆象征与建构的一面，“抗战记忆史”研究除了强调官方书写，还要关注社会诉说，要将社会层面的关于抗日战争的传说故事、回忆经历、诗词歌谣等都纳入考察范围。并且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叙述层面，还需要考察这段记忆的来源、流传与变迁，探究与抗战相关的“亲者”的记忆，¹分析不同的记忆主体对此段记忆的利用与诠释。

反思抗战记忆。反思记忆要关注记忆所产生的影响，结合当前现实明确记忆的未来走向。张连红根据南京大屠杀对南京市民社会心理影响的问卷调查和口述访问，就南京市民的南京大屠杀创伤记忆进行研究。作者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已超越了原始复仇阶段，从某种程度上已被置换为一种“落后就要挨打”的自责和自强意识以及对世界和平的美好追求。因此作者认为创伤记忆理应置换为人类追求和平的宝贵财富，中日两国应该互相理解过去的历史，寻求对南京大屠杀的共同记忆。^{[5] (p147-152)} 该研究点明了南京大屠杀记忆的未来走向，此便是对南京大屠杀记忆的反思。抗日战争带给国家与民族的伤痛与仇恨不应该成为当前抗战记忆的主题，怎样将伤痛记忆转换为符合目前时代走向的记忆，是抗战记忆史研究需要思考的重要议题。

更为重要的是，还需反思抗战记忆的利用问题。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表示，近代民族国家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共同的历史记忆是维系这个共同体的重要纽带。^[33] 抗战记忆作为集体记忆，是维系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的纽带之一，充当着民族与国家认同的媒介。抗战记忆的合理利用能够实现集体记忆的社会化功能，加强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当前对抗战记忆的利用尚存不足之处，以抗战影视为例，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是传达抗战记忆的重要手段，但近年来这些影视剧俨然不顾历史的真实性，秉承“娱乐至上”的原则，将原本严肃的主旋律影视加入武侠、爱情、玄幻等元素，以至如“手撕鬼子”“裤裆藏雷”般令人啼笑皆非的场景频频出现于剧中，这是对抗战记忆的滥用，对抗战历史的歪曲。当无数战士用鲜血换来的和平变成唾手可得胜利时，观众自然无法对抗战的艰辛表现出同情心，无法对国家和民族产生认同感，如此抗战记忆便失去了其应有之价值。面对此类现象，抗战记忆史研究需要对此开展充分的思考，提出意见，同时注重记忆的社会功能、教育功能和现实意义。

四、研究展望

抗战记忆史研究是抗战史研究的新领域，尚处在萌芽阶段，有广阔的研究空间等待发掘。鉴于此，笔者欲结合三个理论层次对未来的抗战记忆史研究展开进一步思考。

（一）图像证史下的抗战记忆史。

长久以来，图像都是作为历史研究的旁证，或是以插图的形式出现在历史书写中。但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国外学者开始尝试用图像作为证史材料，以拓宽历史研究的路径。菲利浦·阿利埃斯在研究欧洲儿童史方面颇有建树，其著作《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就采用了图像证史的研究方法。此书从画像、服饰、雕塑等图像材料出发，探究这些图像所反映的欧洲社会观念、家庭关系、社会结构的变化。^[34] 彼得·伯克将图像研究从实证上升到理论，进一步完善了“图像证史”研究方法。他认为“绘画、雕像、摄影作品等等，可以让我们这些后代人共享未经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过去文化的经历和知识。它们能带回给我们一些以前也许已经知道但并未认真看待的东西。简而言之，图像可以让我们更加生动地‘想象’过去”。^{[35] (p14)} 彼得·伯克揭示了图像的价值作用，他将图像视为历史证据的重要形式。在国外学界的影响下，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图像证史”，并将其纳入历史研究中。葛兆光在《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图像》中指出图像资料本身也是思想史应当注意与研究的文献，他在此文中举出几个相关案例具体明晰思想史视野下的图像研究。^{[36] (p74-83)} 赵世瑜通过分析云南楚雄大姚县石羊镇的文庙中保存的一幅石刻画，揭示了这幅石刻画所反映的“灶商”这一群体的历史记忆及其现实欲求。^{[37] (p24-46)} 可以看到，图像证史在史学领域逐渐发展，抗战记忆史也可在图像证史的指导下，找寻新的突破点。

于抗战记忆史而言，图像不仅是直接的史料凭证，能够提供在文本中被遗忘和忽视的记忆，还“可以帮助后代了解某个时代的集体感受”，^{[38] (p33)} 反映社会记忆。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应该从三个层次去考察图像。首先，直观地观察图像所表达的内容，明确其表面含义；接着，剖析图像的象征意义；最后，结合社会背景、作者生平、时代心态揭示图像的本质内涵。据笔者了解，2014 年，湖南省沅陵县史志办工作人员发现了沅陵县在 1941 年张贴的预防鼠疫活动宣传画。这幅宣传画显示，一只贴着日本国旗的大老鼠被刺刀刺伤，动弹不得，图像上方印着“灭鼠如杀敌”五个大字。据悉，1941 年 11 月，日军向常德空投了大量带有鼠疫杆菌的物品，造成常德城内鼠疫泛滥，常德地区不得已开展大规模的消灭鼠疫活动，而毗邻常德的沅陵县也成为鼠疫防御的重点区域。这幅宣传画的目的不仅是号召人们预防鼠疫，画像的作者将图像中的老鼠比喻成日本，暗示着日本迟早会兵败将

亡，我国会赢得抗战的胜利，以此进行抗战动员。这也反映了该时期人们渴望抗击侵略者的强烈愿望，承载了民众对抗战的历史记忆。

按照彼得·伯克对“图像”的界定，照片、图画、雕塑、徽章、商标、宣传画、时装玩偶、奖章和纪念章上的图像，甚至包括地图在内等所有可视艺术品皆可被视为“图像”。图像证史下的抗战记忆史研究可关注抗战地图、抗战宣传画、领导人画像、军功勋章、商品商标等等。如此，抗战记忆史的研究对象也不再仅仅局限于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关注的战争、革命、人物等宏大事物，其研究视角下移，将目光关注于微小事物，使对抗战记忆深入认识成为可能，同时这也为抗战记忆史提供了更新颖的话题，可丰富其研究成果。

（二）公众史学下的抗战记忆史。

公众史学主张人人的历史都是历史，人人都是历史的记录者，它更强调历史研究中的“公众参与”。公众史学下的抗战记忆史即要以“公众参与”为研究要义。一方面，抗战记忆史要书写公众的历史记忆，让民众成为抗战记忆史研究的主体。另一方面，抗战记忆史研究的学术性应适当下移，让史学趋于大众化。有学者指出公共史学的研究目的即“采访公众的历史记忆，让公众成为身边历史现象的解释者，将民众的民间记忆呈现出来”。^{[38] (p117-124)}这揭示了公众史学与历史记忆的相互关系，可以指导公众史学与抗战记忆史研究更有效地结合。

对普通民众抗战记忆进行研究，依靠目前的文献资料是不够的，因为这些文献资料像回忆录、日记、档案等多是记录精英层面、国家层面的历史，所以该路径下的抗战记忆史料来源便是民众大脑中的记忆，这些记忆可以通过口述调查的方式呈现。目前关于抗日战争的口述调查，最常见者即抗战老兵的调查。自2016年起，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与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合作承担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抗日老战士口述调查采访”，并由此组成5个摄制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采访老兵这一抢救性口述历史工作，截至2018年底，已累计采访1416位老兵。此项工作收集、整理了抗战老兵的抗战记忆，对抗战记忆史研究助益良多。此外，抗战亲历者、农民、市民、华侨的抗战记忆同样值得关注。

当然，口述调查除了梳理被调查者的抗战记忆，也要学会在这些记忆中分析、探究某些问题。虽然研究主体是普通民众，但是普通民众也可分为不同类型的人群，如可以将农民和市民的抗战记忆进行对比，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对抗战的记忆自然也有所不同。或者将底层民众的记忆与精英人群的记忆进行对比，关于长城抗战的记忆，国民政府内政部长黄绍竑、第三十二军军部副官处长唐永良这两位精英人士与第二十九军士兵的记忆就存在差异，这种现象与时代主流、群体认同有关。

^{[15] (p144-148)}记忆主体对记忆的不同表达，能反映该时期的社会、政治状况。

在公共史学路径的影响下，抗战记忆史研究应当加快对抗战老兵、抗战亲历者等底层民众口述调查的步伐，随着他们年龄的增大，这项工作已经刻不容缓。其次，要进行田野调查，挖掘民间的抗战文本，注重地方志、地方档案、家谱、族谱的作用。最后，因长久以来底层民众的抗战资料不受关注而缺乏整理与编写，所以要重视这些资料的整理与归纳，以方便研究工作的开展。

（三）心态史学下的抗战记忆史。

心态史学是年鉴学派史学家在史学方法上的重大突破。心态史学，顾名思义其研究对象就是人们的情感态度。心态史学具有四个特征：首先，它研究的是历史群体的无意识层面，重视无意识心理而非观念史；其次，它研究集体而非强调个人的作用；再次，其不强调时代的断裂，而是强调时代的延续性和反复性以及长时段研究；最后，强调心态脱离经济、社会的独立性。^{[39] (p70)}心态史注重集体性、延续性，与记忆史研究有着相同的特点。

以心态史为参照的抗战记忆史所要研究的，一方面是人们的心态如何塑造与抗战相关的记忆。如国人有重塑中华民族的国

际地位的心态，于是在抗战纪念话语上多将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联系，诸如“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40]“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古老的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征程”^[41]等话语塑造了具有追求世界和平和民族复兴意义的抗战记忆。另一方面，抗战记忆所反映出的心态也值得关注。笔者注意到，自抗战以来民间流传了不少抗战故事，如平西抗日根据地我军用步枪打下日本飞机的故事，百团大战使用“辣椒炮弹”的故事，抗战小英雄李爱民为我军送信的故事等，这类抗战故事即承载了人们的抗战记忆。这些故事带有“传奇”色彩，其艺术性较强，而真实性有待考量。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类抗战记忆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联系，其带有的传奇色彩正反映出民众对共产党抗战地位的认可。

心态与记忆存在辩证的因果关系，即人们对事物的记忆能反映其心态，反之亦然。如此，心态既可以成为抗战记忆史的研究视角，又能成为其研究内容。心态史下的抗战记忆史在考察记忆产生的原因或者记忆蕴含的内涵时，将人的心态纳入考察范围，更加注重“人”的主观因素，此将进一步强调记忆的功能，突显抗战记忆的多样性表达。

五、余论

抗战记忆史所研究的记忆是透过了个人记忆，超越了群体记忆的集体记忆。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了“建构记忆”的理论，他认为集体记忆是社会建构的概念，该观念被多数记忆史研究学者所接受。纵观学界关于抗战方面的记忆史研究，不少研究都将“抗战记忆的建构”作为研究主题，学界对“建构”这条研究路径好像已经形成依赖。正因为抗日战争是政治事件，不仅牵扯到国际关系，也牵扯到国共两党的政治博弈，所以有相当多的研究从抗战的大小战役、各类政治人物、国家性纪念日等与政治相关的视角入手，认为政权为了证明自身的合法性而需要利用和建构对其有利的记忆。多数研究强调记忆是如何被记住，将记忆的主体放置在一个被动的地位，这样就显得其记忆过程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于是便得出这段记忆为建构记忆的结论。如此下去，抗战记忆史研究将会显得单调乏味。

笔者认为抗战记忆史研究应当多注重记忆产生与流传的社会背景，多发掘社会层面的原因。不仅如此，记忆主体的心态、其对此段记忆的反馈都是抗战记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除此之外，研究除了要分析抗战记忆中的政治因素，还要将文化、思想等因素纳入考察范围，使抗战记忆史研究走出“建构记忆”的舒适圈。

参考文献：

- [1]李奕明. 历史再现与人民记忆——评《南京大屠杀》[J]. 电影艺术, 1996, (3).
- [2]逢增玉. 九十年代“抗战文学”的历史记忆与现实诉求[J]. 当代作家评论, 2001, (6).
- [3]郭辉. 中国历史记忆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 兰州学刊, 2017, (1).
- [4]王家范. 从集体记忆的谬误中出走[J]. 史林, 2003, (1).
- [5]张连红. 南京大屠杀与南京市民的创伤记忆[J]. 江海学刊, 2003, (1).
- [6]何亦农, 陆剑杰, 等. 论南京大屠杀与当代民族忧患意识[J]. 南京社会科学, 2005, (8).
- [7]刘燕军.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J]. 抗日战争研究, 2009, (4).

-
- [8]李昕. 南京大屠杀文化记忆的后现代转向[J].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 2018, (4).
- [9]李洪涛, 黄顺铭. 记忆的纹理: 媒介、创伤与南京大屠杀[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 [10]王卫星. 八十年来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J]. 南京社会科学, 2017, (8).
- [11]钟梦媛. 南京大屠杀的媒介记忆研究——以《人民日报》的传播为例[D]. 广州: 暨南大学, 2018.
- [12]郭辉. 抗战时期“九一八”纪念的历史考察[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3, (2).
- [13]郭辉. “七七”纪念与抗战时期的政治动员[J]. 南京社会科学, 2017, (6).
- [14]罗贵榕. 关于滇西抗战叙事的思考[J]. 学术论坛, 2015, (8).
- [15]侯杰, 常春波. 长城抗战的历史记忆与群体认同[J]. 中州学刊, 2015, (9).
- [16]潘洵, 高佳. 抗战时期侵华日军“轰炸记忆”的演变与建构——以“重庆大轰炸”为中心的考察[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6).
- [17]李鹏飞. 抗战时期民族英雄形象的建构——以张自忠为中心考察[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6.
- [18]汤锐. 信仰的纪念: 中国共产党与白求恩模范形象建构过程考察[J].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6).
- [19]郭辉. 抗战时期“成吉思汗”纪念及其形象塑造[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5).
- [20]郭辉, 曾子恒. 抗战时期史可法“民族英雄”记忆的多重建构[J]. 武陵学刊, 2018, (3).
- [21]郭辉, 李百胜. 历史记忆与社会动员: 抗战动员中的“文天祥”记忆[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6).
- [22]李恭忠. 开放的纪念性: 中山陵建筑精神的表达与实践[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4, (3).
- [23]李恭忠. 中山陵: 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24]陈蕴茜. 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以中国近代公园为中心的考察[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5, (5).
- [25]陈蕴茜. 纪念空间与社会记忆[J]. 学术月刊, 2012, (7).
- [26]王晓葵. “广西会战”的纪录与记忆——以纪念碑和遗址为中心[J]. 抗战文化研究, 2011, (00).
- [27]殷冬水. 记忆与权力: 民族自省的政治逻辑——东北沦陷史陈列馆抗战国家叙事的个案研究[J]. 社会科学战线, 2015, (7).

-
- [28]刘于思. 从腾冲忠烈祠到国殇墓园: 战争记忆的空间争夺与权力博弈[J]. 探索与争鸣, 2015, (7).
- [29]郭辉. 战后抗战胜利纪念日述论[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3).
- [30]沈坚. 记忆与历史的博弈: 法国记忆史的建构[J]. 中国社会科学, 2010, (3).
- [31][法]雅克·勒高夫. 历史与记忆[M]. 方仁杰, 倪复生,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 [32][法]皮埃尔·诺拉. 记忆之场[M]. 黄艳红, 等,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 [3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吴叡人,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34][法]菲利浦·阿利埃斯. 儿童的世纪: 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M]. 沈坚, 朱晓罕,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35][英]彼得·伯克. 图像证史[M]. 杨豫,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36]葛兆光. 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图像[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 (4).
- [37]赵世瑜. 图像如何证史: 一幅石刻画所见清代西南的历史与历史记忆[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1, (2).
- [38]钱茂伟. 当代公众专题史建构的类型、路径及意义[J]. 浙江社会科学, 2018, (2).
- [39]李源. 图像·证据·历史——年鉴学派运用视觉材料考察[J]. 史学理论研究, 2010, (4).
- [40]习近平. 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纪念仪式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4-07-08(2).
- [41]习近平.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4-09-04(2).

注释:

1 保罗·科利在他的著作《记忆, 历史, 遗忘》中提到在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两个极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层面, 这个中间层面就是“亲者”。何谓亲者, 保罗解释道亲者就是邻近的他者, 是有优势的他人, 是那些在尊重的相互性和平等性中既支持我存在, 我也支持他们存在的人, 在记忆的归因道路上亲者的纽带横向地并且选择性地穿过血缘关系、夫妻关系以及根据归属的多重形式或者各自的经济地位而分散开来的社会关系。